

国学大师、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佛学家

任继愈谈

『易经』



任继愈◎著



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

石油工业出版社

任继愈
谈

『易经』

任继愈◎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继愈谈《易经》/任继愈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83-2358-6

I. ①任… II. ①任…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3432 号

任继愈谈《易经》

任继愈 著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

编辑部: (010) 64523783

图书营销中心: (010) 645236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5 千字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辑一 《易经》漫谈

《易经》和《易传》 / 003

《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 / 139

《周易》研究小议 / 159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 165

关心《周易》研究促进健康发展 / 173

《易》学与人类文明 / 181

读《易》书札 / 191

《易学智慧丛书》总序 / 197

辑二 哲学谈话三篇

谈中国传统文化 / 203

玄奘为什么不如慧能 / 237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 / 259

辑一

《易经》漫谈

《 易 传 》
《 易 经 》
* 和

*本文是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的一篇，系任继愈和孔繁、牟钟鉴、余敦康、周继旨、阎韬合撰。

一 从《易经》到《易传》

《周易》这部书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是一部占筮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书，但是《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利用了《易经》占筮的特殊结构和筮法建立起来的，因而这两部分在内容上有差别而在形式上却存在着联系，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和宗教巫术的奇妙的结合。封建时代的学者往往只从二者形式上相联系的一面做文章，写了大量的著作（不下三千种），其中有的是袭用《易传》的手法阐述作者自己的哲学思想，有的是在《易经》原有的巫术基础上穿凿附会，引申发挥。这些著作非但不能揭示《易经》和《易传》的真相，反而把原始的核心和后世的积层弄得更加混淆不清，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到了现代，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学者着重于二者内容上的差别，把经传分开来进行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订出它们属于不同的制作时代，反映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研究扫除了笼罩在《周易》这部书上的神秘的迷雾，使人们比较容易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不再去走封建时代的学者所走

过的弯路。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术界曾经开展了一次关于《周易》的讨论，讨论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索，分别就《易经》和《易传》的思想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把《周易》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在讨论中有些人忽视《周易》这部书中本来就有的宗教巫术的成分，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或者是不适当地夸大了《易经》的思想，把它说成是几乎达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或者是从形式上抹杀了《易传》的特征，看不见易筮对它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周易》这部书，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中外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到其中两部分的内容上的差别和形式上的联系，既不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完全割裂开来，就可以发现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幅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缩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的抽象思维逐步提高的过程，可以看到这种在宗教巫术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怎样扬弃了宗教巫术的内容，同时又利用了宗教巫术的形式，从而使自己带上了不同于其他一些哲学思想体系的特点。

占卜这种宗教巫术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曾普遍流行，形式多种多样。殷人盛行龟卜，周人龟卜筮占并用。司马

迁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古代希腊多半根据飞禽和牺牲的脏腑占问吉凶，也有凭借神圣橡树的叶声和溪涧的水声占问吉凶的。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猪胆卦、牛肝卦、鸡骨卜、羊骨卜，也有掷木卜、木刻卜、草卜、竹卜，等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占卜形式中，为什么唯独从周人的筮占中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思想体系，而其他的占卜却始终停留在宗教巫术的阶段，这种现象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应当承认，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占卜这种宗教巫术表现了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占卜来进行判断和推理，做出估计和决定。但是也应当看到，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人们不可能通过占卜取得任何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因为占卜阻碍人们认识客观外界，干扰正常认识活动的进行。占卜把决定人事吉凶的普遍原因归结为神的意旨，把占卜所用的道具看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手段。在占卜中，人们观察的目的不是认识客观外界，而是

探测神的意旨；人们观察的对象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占卜道具所显示的变化。占卜道具所显示的变化和客观事物本身的变化本来没有任何必然性的联系，但是占卜者却用种种主观比附的方法把它们说成是必然的，这只能导致对现实的歪曲。在有些情况下，占卜似乎也很灵验，能够做出与现实相符的预测。实际上，这种灵验并不是通过占卜取得的，而是由于占卜者摆脱了占卜的思维模式根据现实的生活经验进行推论的结果，很显然，从不知道占卜到有目的地使用占卜，虽然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但它对认识的发展却不曾起到什么积极的推进作用。

拿殷人盛行的龟卜来说，他们每事必卜，怀着虔诚的心理辛勤地把占卜的结果记录下来，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卜辞。这些卜辞广泛地反映了殷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殷代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是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卜辞中所表现的殷人的思维水平是相当低下的。这是一大堆散漫而无系统的感性材料，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在卜辞中，我们找不到具有抽象意义的词汇，也看不到殷人当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事实上，殷人在观测天象、从事青铜工艺以及组织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都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积累了不少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没有完整地反映到卜辞中。在卜辞中，我们看到殷人好像是在进行判断和推理，他们认真而仔细地根据龟甲裂纹的形状判断吉凶，推论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由于他们把占卜道具摆在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中间，错误地认为龟甲裂纹的变化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所以他们的判断和推理就与客观事物实际上脱离了关系，只能凝结成一些主观的臆想，而不能取得任何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卜辞记录的年代上下几百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只在叙事的表达方式上有一些微小的进步，在思维水平上却看不出有什么提高。这种情况说明了占卜的思维模式堵塞了人们认识外界的正常通道，不能促进人类认识的发展。

就思维的模式来看，周人的筮占和龟卜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龟卜是用龟甲裂纹的形状来阻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接触，筮占则是用著草排列的方式，这和用猪胆、牛肝、树叶、溪水以及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道具是一样的。《周易》筮辞的绝大部分就是依据这种思维模式进行占卜的记录，和卜辞一样，它们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关系既不能有所肯定也不能有所否定，完全是一些主观臆想。比如《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这句话好像是经过

判断和推理的，在“王用亨于岐山”和“吉无咎”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主观臆想的结果，不具有任何的客观确实性。再以筮辞中常见的“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凡十三见）为例，究竟涉大川这件具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有利，在什么情况下不利，筮辞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知识。这两个结论完全是依据耋草排列的某种方式得出来的，并不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关系。

但是和卜辞相比，《周易》筮辞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有一些显明的特点。

第一，在内容上，《周易》筮辞除了占卜的记录以外，还有一部分不是占卜的记录，而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比如：

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屯卦》六三爻辞）

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爻辞）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卦》九三爻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恒卦》九三爻辞）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卦》六三爻辞）

这几条筮辞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和认识意义，和神的主旨无关。它们不是依据占卜道具显示的某种变化做出来的主观臆想，而是摆脱了占卜的思维模式，直接观察认识对象并且逐步深化的结果。类似这样的内容，我们在殷人甲骨文卜辞中是找不到的。

第二，在形式上，《周易》筮辞已经借助于占筮的特殊结构进行了加工整理，按照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体系编排成了一个系统，不像卜辞那样毫无条理。这个系统尽管是从作为占卜道具的蓍草的排列方式上推演出来的，和筮辞的内容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由于它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它把一些内容有某种关联的筮辞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编排在一起，使人们从一些个别具体事物的映象上升到认识事物的全体和关系。比如《乾卦》的六条爻辞，如果孤立起来看，只是一些个别具体事物的映象，但是一旦借助于这个系统组织起来以后，就提供了更多的认识意义，促进了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看出古人设想的一条龙从潜藏水底到飞向天空的变化活动的全过程。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和内容无关，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编排。但是即便如此，它也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启发人们从爻位变化的规律上去探索，找出本来是不具条理的各条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讼卦》的几条爻辞：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九二爻辞）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九四爻辞）

讼，元吉。（九五爻辞）

这几条爻辞本来是几次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的占卜记录，内容上互不相干，但是单从形式上的联系来看，它们按照九二、九四、九五的程序编排在一起，也促使人们把思维对象从个别具体事物的身上转移到一事物发生着的过程上来，从而启发人们去探索争讼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为了对已经积累起来的思维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卜辞没有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所以不可能做进一步加工整理的工作，而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一事一卜、依靠神的指示的水平上。《周易》筮辞找到了一种组织形式，尽管这种组织